



民族语文研究 情报资料集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语言室编



1
1983
1



目 录

· 译 文 ·

- 兰司铁与阿尔泰语言学……………[芬兰] P.阿尔托著 (1)
张继忠、高宝珍译
刘照雄校
- 论阿尔泰诸语言的亲缘关系问题及解决这
一问题的方法……………[苏]H.安德列耶夫、O. 苏尼克著 (22)
陈 伟译
- 十四世纪蒙古语里的突厥成分……………[英] Д.К. 克劳森著 (34)
刘照雄、张继忠译
- 早期突厥语的外来成分……………[英] Д.К. 克劳森著 (44)
魏萃一译
- 朝鲜语的起源……………[南朝鲜]朴炳采著 (49)
赵 习译
- 朝鲜语的深层结构……………[南朝鲜]高永根著 (53)
宣德五译
- 拉萨话元音的和谐……………[美] 张琨、贝蒂·谢芙茨著 (58)
瞿霭堂译
- 苗瑶语声调构拟……………[美]张 琨著 (87)
贺嘉善译
- 罗罗一语语言比较研究中的问题……………[日]西田龙雄著 (122)
陈 鹏译
应 琳校

语系分类近况·····	[美]沃格林著 (139)
	乐赛月译
	吴妙发校

· 人物介绍 ·

杰出的阿尔泰语言学家兰司铁·····	少 英 (151)
汉藏语言学家 J·A·马提索夫·····	傅云起 (154)

· 书刊简介 ·

三部苏联阿尔泰语言学论文集简介·····	紫 群 (161)
----------------------	-----------

· 学术会议 ·

第四届国际蒙古学家会议简况·····	高宝珍编译 (165)
第十五届国际汉藏语言学会议上我国民族语文研究 论文提要 (四十二篇) ·····	本刊编辑部辑 (170)
下期目录 ·····	(封三)

兰司铁与阿尔泰语言学

本蒂·阿尔托

现今称作芬兰—乌戈尔语的各种语言的发生学同源关系原来是根据非常表面的观察资料提出的。约翰尼斯·谢非鲁斯 (Johannes Schefferus 1621—79) 在他的著作“拉普语”

(Lapponia) (1673) 里, 根据类似的理由试图把芬兰语和拉普语同当时极少为人所知的萨莫耶德语联系起来。柏林的威廉·绍特 (Wilhelm Schott 1802—89) 教授研究了称作阿尔泰语的各种语言, 并且把它们看作芬兰—乌戈尔语的亲属语言。当时, 匈牙利学者塞缪尔·吉阿玛西 (Samuel Gyarmathi 1751—1830) 用他们的方法, 例如, 依靠各种语法比较的方法, 研究芬兰—乌戈尔语所取得的成果代表了真正先进的成就。丹麦语言学家拉斯姆斯·拉斯克 (Rasmus Rask 1787—1832) 实际上发现了历史语音演变规律的原理, 他把许多种东半球的语言合为一个大语系。

当卡斯特连 (M. A. Castrén 1813—1852) 1839年发表第一篇论文时, 印欧比较语言学的创始人弗朗兹·葆朴 (Franz Bopp 1791—1867) 的比较法在芬兰是众所周知的。在德国研究梵文、与卡斯特连同时代而较年青的赫尔曼·凯尔格伦 (Herman Kellgren 1822—1856) 1846年在耶纳 (Jena) 向德国语言学家会议提出了一篇文章“论阿尔泰语言复数的形成”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Plural in the Altaic languages)^①。

卡斯特连对芬兰语和突厥语、蒙古语以及通古斯语可能有亲缘关系也感兴趣, 不过他认为对所有这些语言实际了解的都不够; 他在给斯内尔曼 (J. W. Snellman) 的信里写道: “迄今为止, 我们甚至不了解支配芬兰语系的特点和各种规律; 怎样比较这个x与蒙古语的z才有道理” (详细内容参看NRF II pp. 163—164)。不过, 早在两年前, 他曾告诉过斯内尔曼, 他的目的是要证明“我们芬兰人不是孤立于世界历史之外的民族, 而是和至少六分之一的人类有关系。”把语言学跟人类学探讨的亲缘关系混淆起来似乎曾经是个很普通的错误。语言的变迁一般解释为民族的迁徙。所以卡斯特连后来想把芬兰人的“发源地”定在阿尔泰地区。在他的学位论文“阿尔泰语言的人称后缀” (*De affixis personalibus linguarum Altaicarum*) (赫尔辛基, 1850) 里以及在他的历次学术讲演里, 他认为芬兰—乌戈尔语及萨莫耶德语和通古斯—蒙古—突厥语族的亲缘关系已被证实。不过, 他是在1841—49年间在北俄、西伯利亚和蒙古的历次不平凡的旅行过程中, 经过极其艰巨的努力才获得这种确切信念的。卡斯特连为了弄清楚芬兰语和蒙古语的亲缘关系而系统地研究了各种中间语言。在调查了各种东部芬兰—乌戈尔语之后, 他来到萨莫耶德人的居住地, 并且证实了他们的语言和芬

注: ①这篇讲演1846年发表在“德国东方学年鉴” (Jahresbericht der DMG) 上, 在一篇内容详尽的草稿中则单独题为“芬兰语与乌拉尔—阿尔泰语系的特殊关系初探” (*Die Grundzüge der Finnischen Sprache mit besonderer Rücksicht auf den Ural-Altaischen Sprachstamm*) (柏林, 1847)。

兰—乌戈尔语有亲缘关系。当他调查叶尼塞地区的各种突厥语时，他认为它们和萨莫耶德语有亲缘关系，作为最先研究过口头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学者，他认为有可能把这些语言同各种突厥语联系起来。

卡斯特连的赫尔辛基大学芬兰语教授一职的继任者们对各种突厥语也感兴趣。例如，奥古斯特·阿勒奎斯特 (August E. Ahlqvist 1826—89) 调查了喀山鞑靼语和楚瓦什语，但是他没有发表他的资料。无论如何，他看来承认了已提出的“乌拉尔”和“阿尔泰”语系之间的同源关系。阿尔维德·戈内茨 (Arvid Genetz 1848—1915) 在他的“喀山鞑靼语语法” (Kazan Tatar grammar) 里同样说芬兰—乌戈尔语及突厥—鞑靼语和萨莫耶德语、蒙古语及满—通古斯语一起构成“阿尔泰”语系。

奥托·顿奈尔 (Otto Donner 1835—1909) 研究了印欧语言学，以便将其方法用于研究芬兰—乌戈尔语。他在德国期间发表了一篇论“阿尔泰语言里的人称代词 I，芬兰语” (Das Personalpronomen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 I, Die Finnische Sprache) 的论文 (柏林, 1865)。后来，作为梵文讲师及比较语文学教授，他特别主张加强芬兰—乌戈尔语和阿尔泰语的研究；术语学还是相当不明确的。由于顿奈尔的努力，芬兰—乌戈尔语学会于 1883 年建立，学会的目的是对卡斯特连创办的所有研究芬兰—乌戈尔语和阿尔泰语的部门加以组织并给以支持。1893 年他向学会建议，应当派一位芬兰语学者去土耳其斯坦和蒙古，研究当地的多种语言并进行考古调查，尤其要寻找古代碑文。

不过，顿奈尔物色到他从前的学生 兰司铁 (Gustaf John Ramstedt) (1873—1950) 作为完成这些任务的适当人选时，已经是 1897 年了。兰司铁原来学神学和东方语言，但是他很早就改学梵文、瑞典语 (他的母语) 以及其它语文学科目。1895 年他得到学位后，在家乡图尔库 (Turku) 的瑞典语学会当瑞典语教师。顿奈尔将兰司铁邀到赫尔辛基，兰司铁在顿奈尔的财政帮助下在那里开始准备所计划的赴蒙古的考察旅行。他详细研究了语音学、各种芬兰—乌戈尔语和俄语。1898 年兰司铁调查了伏尔加中游所谓的切里米斯山地 (Mountain Cheremis) 语，以便亲身实践芬兰—乌戈尔语学者们发展的野外调查方法。由于当时大多数芬兰—乌戈尔民族仍都缺少文学，语言研究不得不集中于口语，为了记录语言学资料，各种专门的方法连同十分准确的语音拼写系统一起得到了发展。卡列瓦拉 (Kalevala) 证明了民间传说对于了解各民族的初期民族文化以及初期纯正的语言都有极大的重要性。因此，考察者们研究各种当地语时总是特别注意有关民族的民俗学传统。兰司铁的切里米斯语研究终于发表了^②，在喀山停留的若干周内，他对该文作了最后的修改。他在这里也熟悉了喀山大学——它在俄国和欧洲都是一个第一流的东方学中心。他原来计划从旧的蒙古文学语言开始研究蒙古语，但是喀山大学著名的突厥学家卡塔诺夫 (N. F. Katanov) 教授也通晓蒙古语，他使兰司铁相信书面语言没有实用处，因此最有效的作法是马上开始学习蒙古口语。兰司铁曾经想在喀山研究各种突厥语，在卡塔诺夫首先发表了内容丰富的突厥文集后，他才决定倾全力于蒙古语^③。于是兰司铁在冬季携家旅行到库伦 (Urga)，在那里一位挪威传教士内斯特加尔德 (O. S. Naestegaard) 帮助他熟悉居民和语言。兰司铁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会了实际应用喀尔喀方言，该方言和古代文学书面蒙古语差别极大。他在为一部完备的字典收集蒙古语单词时很快就发觉了，为了各种词源学的目的可能必须依赖突厥语和满—通古斯语的资

注：② 山区切里米斯语研究 (*Bergtscheremissische Sprachstudien*) (MSFOu X Ⅷ, Helsingfors 1902, xii + 218 pp.)。

③ 1898 年 9 月 16 日自喀山给奈顿尔的信，以及 10 月 13 日给赛台策 (Setälä) 的信。

料。他在给顿奈尔的一封信（库伦，1900年1月21日）里要--部拉德洛夫（Radloff）的词典和所有可以得到的满一通古斯语资料。他一接到词典就写道（1900年5月5日），这本词典对解释蒙古语单词的用处已经得到充分证明。兰司铁在乡村作了广泛的旅行之后，于义和团运动爆发时被迫离开蒙古，他在这些旅行里收集到大量语言学和民俗学资料。他长期住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Troitskosavsk）继续研究，并且也常去访问附近的布里亚特人。

兰司铁在给顿奈尔的一封信（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1900年12月11日）里指出，蒙古语里最古老的宗教术语显然是突厥语的，而且里而甚至有起源于伊朗语的词。这些词一定也是经突厥语传来的。另一方面，突厥语和蒙古语最古老的词表现出许多共同点。看来年代越早，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别就越少。

兰司铁起程回国时为了省钱用货车运送他收集的资料，结果这些东西被盗了。西伯利亚铁路当局付了赔偿费，但是科学上的损失当然是无法弥补的了。据兰司铁的信件看，他在特罗伊茨科萨夫斯克时已经开始论述蒙古语的动词派生和词尾变化。他从失去非常宝贵的资料的沮丧中恢复过来之后，在1902年根据一些笔记并且凭借自己惊人的记忆力写了博士论文“喀尔喀蒙古语的动词变化”（*Ueber die Konjugation des Khalkha-Mongolischen*）〔芬兰-乌戈尔学会文集（MSFOu XIX）〕。兰司铁在把各种口头方言和旧蒙古文学语言的形式作比较时努力构造了古代“共同蒙古语”形式，然后把这些形式和据他的意见可以看作有词源关系的突厥以及满一通古斯语言形式做比较。这类识别里有一些是在包特林克（Boehtlingk）、拉德洛夫、卡塔诺夫和其它学者的较早的著作中发现的（1901年8月22日，兰司铁给顿奈尔的信）。兰司铁在后来的一封信（1902年6月30日）里写道，最古老的蒙古语后缀特别值得注意，看起来它们和较古的突厥语的形式非常相似，而满语的大部分相似形式好像是来自各种蒙古方言的较古或较新的借词。因此，他对蒙古语—满语的同源问题暂时还不敢表示任何明确的态度。正如兰司铁用过的文献的目录所表明的，除了实际的突厥语知识外，他又有了几个比较重要的突厥语工具可供使用。关于各种通古斯语则只有卡斯特连的语法和词汇表，以及扎哈罗夫（Zakharov）的“满语语法和词典”（*Manchu grammar and dictionary*）。兰司铁在西伯利亚亲身遇到并且访问过一些说通古斯语的人。

下而是兰司铁在博士论文的序论（P. Vii）里扼要讲述的他当时的观点：

评论者可能武断地认为，在我把蒙古语和突厥—鞑靼方言以及满语排比时，于先已“确实地”研究了这些语言的语音史。面对我发现的这种巨大的一致性，我不可能有其他的办法，尽管有怀疑的见解，我仍主张有“祖语”（*Ursprachen*）和“原始共同体”（*Urgemeinschaft*）。我看到一系列明显的共同点，但是由于我对这些有关语言的肤浅知识，对其来源仍是不清楚的；或许这是由于借用而来的共同点，但是借自何方，我说不出来，因此，这不肯定的意见是：“蒙古—突厥语言”，“蒙古—满语”或者其他。当时大亚西亚（hochasiatischen）各游牧民族之间并没有固定的疆界和居住地区，彼此是很接近的，在上千年的共同生活、争战的过程中，相互吸收了譬如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借词，难道这就是共同“祖语”？我想，寻找语言的重要成分—动词变化，在突厥—鞑靼语言和蒙古语言之间反映出来的许多如此高度相同的形式，我设想，大概也表明这些民族彼此接近。关于通古斯语与蒙古语的关系我还很难说清楚，因为对通古斯语言还很缺乏研究。因此，我准备把满语与蒙古语言之间的共同点，一般作为古的或最近的借用成分最后加以说明。

匈牙利东方学杂志 (KSz) (IV, 1903, p. 111 ff.) 发表了威廉班 (Willy Bange) 对兰司铁的著作的评论, 他在评论里批评兰司铁关于动词变化的说法, 无视蒙古语动词明显的名词性特征。他写道: “为什么不把喀尔喀语的全部后缀一股脑儿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兰司铁的第二篇论文“书面蒙古语和库伦土语语音比较” (Das Schriftmongolische und die Urgamundart phonetisch verglichen*) [芬兰—乌戈尔学会杂志 (JSFOu) XXI, 2, 1903] 对研究蒙古语历史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论文原稿是他从库伦寄回国的。这篇论文实际上丝毫没有涉及蒙古语的外部亲缘关系。虽然兰司铁原来的研究目的是调查蒙古语, 但是事实本身还是使他集中注意亲缘关系问题。然而, 他即使在继续研究时也倾全力于蒙古语。赫尔辛基大学授予兰司铁一份奖学金, 使他能够作一次预计为期三年的旅行, 行程经阿富汗、拉达克、外蒙、内蒙和满洲, 到列那 (Lena) 的布里亚特。他的主要目的是访问极少了解或完全没有考察过的蒙古各部落。1903年3月他开始在伏尔加河畔的卡尔梅克人里作调查, 收集语法、单词和民俗学材料。这些卡尔梅克语调查预定作为他赴阿富汗蒙古人居住地旅行的一项准备, 因为已经知道后者的语言尤其和西部蒙古语, 即卡尔梅克语, 表现出较密切的亲缘关系。在已证明不可能进入阿富汗本部时, 兰司铁旅行到俄阿边境的库什克 (Kushka) 要塞, 他幸运地找到了两名来自阿富汗方面会说莫戈勒语的工人。兰司铁克服了许多困难, 在四天里记下了包括500个左右不同单词的大约200个短句。但是, 他在得了一场很重的疟疾之后不得不把他刚刚找到的发音人送回国并且回到赫尔辛基。兰司铁发表“莫戈勒语” (Mogolica) (JSFOu XXIII, 4, 1905) 是这次旅行的收获, 尽管材料有限, 该著作仍然是五十多年来我们了解那种语言的基础。兰司铁在词汇表里引用了对应的书面蒙古语形式并且介绍了波斯语借词。此外很少谈到其它语言。

1904年4月兰司铁大大复元, 得以动身作第二次卡尔梅克之行。他住在撒里普塔 (Sarepta), 常去巴嘎—楚卡尔 (Baga—Chokhor) 和顿河—卡尔梅克 (Don—Kaimucks) 旅行。秋季他访问了高加索, 调查了突厥诺盖人 (Nogais) 和库慕克人 (Kumyks) 的语言。他于1904年10月20日从阿基库拉克 (Atsikulak) 寄给赛台莱的信里说: “我从来没想到对鞑靼语作一次比较仔细的调查, 发展成现在这种大大说明蒙古语历史的情况。诺盖语十分接近喀山鞑靼语, 它更保守一些而且或许有点象吉尔吉斯语。在圣彼得堡拉德洛夫说过, 从蒙古语的角度考察鞑靼语至今没有这样做过, 因为突厥学家——甚至拉德洛夫本人——通晓蒙古语只是徒有其名。因此他认为这次旅行对我将非常有用。确实是这样。词源多得我都说明不过来。我在此处积存的单词里每两个里有一个似乎曾经见过。我逐渐发现了各种类型的语音规律和标准, 它们证明, 从前不明白的各种对应是借词 (从蒙古语借入鞑靼语比其它途径更常见) 或较古老的相似词 (similarities)。例如: 各种鞑靼方言没有词首的 *n-*, 但是蒙古语有 *n-* 的地方鞑靼语有个 *y-*。甚至在元音音的位置上蒙古语有时有 *n-*, 鞑靼语有 *y-*。因此, 就我的记忆而言, 原来的 *-n-* 或鼻音化的 *-y-* 正如雅库特语里……” 由于日俄战争, 兰司铁不能去蒙古, 于是他取道鄂木斯克 (Omsk) 和塞米巴拉金斯克 (Semipalatinsk) 前往东土耳其斯坦, 1905年5月到达楚古查克 (Chuguchak)。他在这里调查了满洲要塞上只有大约十个人说的昂阔尔索伦 (Onkor Solon) 方言。但是他的材料至今也没有发表^④。兰司铁接着在石河

* 应为 *vergleichen* ——译者。

注: ④科特维奇 (Wl. Kotwicz) 的学生, 年青的俄国学者费多尔·木鲁姆斯基 (Fedor. V. Muromskij) 1907—1908年调查过同一语言, 他的词汇集。1971年由卡鲁日斯基 (St. Kalużyński) 在“东方学年刊” (RO) XXXI, 1, pp. 39—77, 2, pp. 35—56上发表。

(Shiho) 和乌鲁木齐调查了当地吐尔扈特人所说的方言, 结果证明该方言和伏尔加地区的卡尔梅克人的方言有十分密切的关系。1905年10月他在给赛台莱的一封信的边空上写道: “突厥—蒙古语的各种关系正在继续搞清楚。” 他的仆人阿尔沙 (Arsha) 是个很好的发音人并且善于讲故事。兰司铁在很短的时间里掌握了吐尔扈特语。因为对日战争失败, 在西伯利亚引起了混乱的局面, 他的归国之行是很冒险的。1906年夏季, 兰司铁在国内依靠两名卡尔梅克当地人的帮助, 修订了他的卡尔梅克语材料, 两名当地人, 桑吉·巴亚诺夫 (Sanji Bayanov) 和诺开·奥奇洛夫 (Nokhai Ochirov) 是为此目的请到芬兰来的。兰司铁研究卡尔梅克语的一项成果是后来发表的“卡尔梅克故事” I—II (Kalmückische Marchen) (MSFOu XXVII 1—2, 1909—1919)⑥。

1906年12月至1907年2月期间, 兰司铁根据自己的研究, 在圣彼得堡大学就突厥语和蒙古语的语音史向东方学系师生和几位科学院的成员作了若干次讲演。

兰司铁第一次讨论到突厥—蒙古语的比较形态学, 看来, 就是在他论蒙古语的代词系统的短篇论文的附录里 (JSFOu XXIII, 3, 1904—05) 被发现的。他在这篇论文里提出的蒙古语复数后缀 -s 和 -t 跟突厥—雅库特语第三人称领格后缀里 -s ~ -t 成分的识别有点难于理解。看来雷赞恩 (Räsänen) 在他的比较语法里没有讨论过突厥语的 -s ~ -t 的起源。据孟格斯 (Menges) 说 [“突厥语言和突厥民族” p. 114 (The Turkic Languages and Peoples)], 雅库特语的 -t 大概起源于指示代词。

各种印欧语通常被当作语言等同源关系的范例。可是, 看来它们实际上反映了一种特别有利的偶然情形。例如, 它们的数词之间的亲缘关系比别的语系更完全, 更清楚。甚至兰司铁在他的论文“阿尔泰语言的数词” (Ueber die Zahlwörter der altaischen Sprachen) (JSFOu XXIV, 1, 1907) 第一页上说, 芬兰—乌戈尔语的数词无疑是那些语言同源的证据, 也是言过其实的。正如科林德尔 (Collinder) 所指出的 [“乌拉尔语有亲缘关系吗?”

(Hat das Uralische verwandte?), 乌普萨拉 (Uppsala) 1955, p. 112], 各种芬兰—乌戈尔语里共同的基数词只有‘二’—‘六’, 它们之中只有‘二’和萨莫耶德语一致。由此推断, 各阿尔泰语言里共同的数词‘四’ (突厥语 tört, 楚瓦什语 tavat, 蒙古语 dörben, 通古斯语 digin, duin, 朝鲜语 turi, 北部朝鲜语 nduin ~ nei, 全部 <*dō-) 应当构成充分的证据。兰司铁在论文里对以前关于“阿尔泰语” (主要是突厥—蒙古语) 数词作出的某些解释提出批评意见, 并且讨论了有类似作用的词。例如, 他确信蒙古语 ikires ‘孪生子’ 和突厥语 ikiz 的同一性, 可是不能确定这种同一性是否来自发生学同源关系或者是个借词。后来, 他在这篇论文的抄本里删去了后一种可能。按照兰司铁的意见, 各阿尔泰语的数词是以手指计数以及甚至常常以隐晦的“符号”表示法为基础 (§14 p. 9 ff)。用手指秘密计数在印度也是众所周知的, 所以它有可能来源于中亚。兰司铁在以后的历次讲演和文稿里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 我把这些成果全都收入他的“导论”形态学的第三章里 (pp. 62—67)。那里考虑的朝鲜语的各种比较看来为其它阿尔泰语的一些不清楚的数词表示法提供了合理的解释: 突厥卡拉伊语 hottuz ‘三十’ (我在上文里没有引用) 看来似乎对兰司铁把突厥语 otuz 和朝鲜语 pottari ‘捆’ 作比较提供了依据。最早的原始印欧语的计算系统明显是五进位的,

注: ⑥ 他其余的卡尔梅克和吐尔扈特语材料在他去世后发表在 JSFOu 58, 2, 1956, 以及 63, 1, 1962, 和 67, 3, 1966 上。

所以它是以手指计数为根据的,这是公认的事实^⑧。但是,甚至连兰司铁的学生雷赞恩在他的“突厥语形态学材料”(Materialien zur Morphologie der türkischen Sprachen) (“东方学研究”XXI, 1957, p. 76)里,看来都没有考虑到手指计数原理,所以,他不可能明白兰司铁的各种词源。看来朝鲜语 *tasat* ‘五’和蒙古语 *tabun* ‘五’以及满语 *tofo-xon* ‘十五’里的 *tofo*,寻根究源是表示‘合上的手’,而朝鲜语 *jəl* ‘十’,蒙古语 *arban* ‘十’大概是‘张开的手’,正如芬兰语 *kymmenen* ‘十’必定是 *kämmen* ‘张开的手’一样。雷赞恩通过朝鲜语 *pom* ‘年’解释满语 *xon* 以及通过构拟的突厥语 **hon* 解释阿尔泰语表示‘十’*on* 的词(在上述引文中),看来缺乏证据。因为保存了 *h-* 以代表初始的 **p-* 的卡拉伊语读作 *oun*。在萨莫耶德语里可能和芬兰语 *viisi* ‘五’对应的词意思是‘十’!

兰司铁有关卡尔梅克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卡尔梅克语词典”(Kalmückisches Wörterbuch) (LSFOu III),从首次访问卡尔梅克之后他就不断地编写这部词典。1912年兰司铁在给赛台莱的一封信里说,突厥语和蒙古语共同的词“不可能很多”。他至少能分辨出突厥语里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较古的一个和古蒙古语同时期,而较近的一个从特征上看是突厥语。当然,除了突厥语的借词之外,蒙古语没有显现受到突厥语的影响。词典的部分稿子1917年就交给工人印刷了,但是这部著作直到1935年才印成。因为兰司铁对原稿后面各部分的修订一直进行到三十年代,所以这些部分所包括的,例如,朝鲜语对应词傍注就比该书的开始部分多。

1909年,当西伯利亚铁路当局付清兰司铁被窃行李赔偿费时,由考古学家萨卡里·帕尔西(Sakari Pääsi)陪同,学会再次派他去蒙古。考察队特别注意考古学的研究。首先对兰司铁第一次在蒙古逗留期间在纳来喀(Nalaikha)盆地发现的墩欲谷纪念碑的古突厥碑文以及在苏吉(Sudzi)的回鹘碑文作了充分的调查和仔细的拍照。接着,考察队在靠近施尼-乌苏(Shine-Ussu)的地方发现了一个长的、但是破碎的、有特殊历史重要性的回鹘碑文。两个回鹘碑文都由兰司铁发表在“卡斯特连纪念专集”(Castrén Memorial Volume)里(JSFOu XXX, 1913—18)。

1912年,兰司铁和语音学家阿尔沃·索塔瓦尔塔(Arvo Sotavalta)一起又一次访问了蒙古。除了进行考古调查之外,兰司铁进一步补充了喀尔喀方言的词汇资料,并且收集了民间传说。

兰司铁在论文“萨莫耶德语—阿尔泰语的关系”(Zu den samojedisch-altaischen Beziehungen) [“芬兰—乌戈尔研究”(FUF) 12, 1912, pp. 156—7]里推想,萨莫耶德语的‘狗’ **wenə* 这个词可能和通古斯语的‘狗’ *gen* < **genə* 有关系,此外可能和蒙古语的 *gendü* ‘公的’有关系。后一个推想是根据芬兰语里两个相似的词 *koira* ‘狗’, *koiras* ‘公的’作出的。兰司铁把原稿送交当时“芬兰—乌戈尔研究”的编辑赛台莱时指出,他的词源学显然很大胆,“但是有时候人必须冒险”。兰司铁在“威廉·汤姆森纪念文集”(Festsch-

注:⑧塞米伦伊(O. Szemerényi),“印欧语数词系统的研究”(Studies in the Indo-European System of Numerals),海得堡,1960, passim. 波洛梅(E. Polomé),“表示‘五’的印欧语数词和赫梯语 *panku* ‘全部’”(The Indo-European Numeral for ‘Five’ and Hittite *panku* ‘All’),Pratidānam Kuiper,海牙,1968, pp. 98—101. 一个重要的细节由赫宁(W. B. Henning)在论文“*ok to(u)*”里作了解释,此文见“语文学会会报”(Transactions of the Philological Society) 1948, p. 69; Avestan *ašti* ‘四个手指’宽,手掌是由带有和‘拳头’(古斯塔的纳维亚语 *pesti*, 盎格鲁—撒克逊语 *fýst*, 古高地德语 *fast*) 相同后缀的 **asta* (< **okto-*) 派生的。

rift für Vilhelm Thomsen(莱比锡, 1912) 182-7 页上发表了论文“蒙古语唇擦音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s labialen Spiranten im Mongolischen)。他在上述关于蒙古语历史语音学研究的俄译本里〔“蒙古书面语和喀尔喀—库伦土语语音的比较”(Svavnitel'naya fonetika mongol'skago pis'mennago yazika i xalxasko-urginskago govora), 圣彼得堡, 1908, p. 19f〕把蒙古语的继发长元音解释为起因于已经消失的元音间的-γ-。通古斯语和突厥语的各种对应屡次证明这种解释。但是, 跟后面这些语言的比较表明, 在其它环境里蒙古语原来有过*-q-或*-w-~-β-, 它也已经消失并且产生了类似的继发长元音。兰司铁就在这篇论文里研究了各种带初始的-w-的例子。但是, 看来在他的材料里只出现一个通古斯语的类似的例子(p. 184): 蒙古语 nege- ‘打开’, 通古斯语 nī-, 满语 nei-, 同时他引用了大量的突厥语对应的词。兰司铁假定(p. 186)初始的*w-出现在反身后缀(蒙古语 -ban~-iyan~-van<*wan>通古斯语 men ‘自己, 自己的’)里, 他为此甚至引用了萨莫耶德语、克特语和考特语的类似例子。兰司铁在论文结尾指出: 蒙古语关于非第一音节的元音以及 d-, j-, y-, n-, ŋ-这类词首辅音(这些辅音在突厥语里全都凝聚成y-)的保存是极保守的。但是在“导论”里, 对初始的*w-的问题看来未置一词就放过去了。蒙古语 ke-üreg, keberereg, 卡尔梅克语 kūræg, 喀尔喀语 zewrək, 突厥奥斯曼语 güvrək, 吉尔吉斯语 küirək ‘脆的, 易碎的’这一类例证(p. 186)和现代通古斯语 kepul- ‘打破’, kepu-me ‘嫩的’, 朝鲜语 keb*jeb- ‘明亮的’(“导论” I p. 145)是有关系的(在SKE p. 82. s. v. kabajapta 有更进一步的说明)。兰司铁大概把*w-看成是非初始的较古的唇音(labia, clusile)的代表, 他在上述论文187页上已经提到这种可能性。

赛台莱为他独自研究乌拉尔语辅音的交替, 曾经请兰司铁提供阿尔泰语类似的例证。兰司铁在1912年3月15日自拉蒂(Lahti)寄出的一封信里谈到上述论文, 并且引用附加条目来表示象g~Y~φ(例如, 蒙古语 segü-, 卡尔梅克语 zū- ‘装饰, 穿’~突厥语 yak ‘上马具’), q~φ, m~φ, m~y~φ 一样的交替(例如, 雅库特语 xomurduos ‘甲虫’~突厥语 qoquz ‘同前’, 阿尔泰语 qös ‘同前’~通古斯语 kaqer ‘同前’~蒙古语 qour ‘同前’; 蒙古语、突厥语 qoqYur ‘棕色的’~突厥语 (Tu)*qour>阿尔泰语 (Alt.) qōr ~楚瓦什语 çamār, 俄语 коpың~кaуpың ‘棕色的, 淡红色的’; 蒙古语、卡尔梅克语 ötäñ ‘脸的内侧’(inner side of cheek)~突厥奥斯曼语 avurt, 特伦吉特语 (ürt<*oqurtin)。看来 b~m 的交替至少部分地由后面的鼻音来决定(蒙古语 bi ‘我’: minu ‘我的’, ebür ‘前面的, 前面’: emüne ‘在…之前, 在…的前面’等等)。

在故乡拉蒂镇当中学教师的兰司铁自1906年起又担任了大学的阿尔泰语言学讲师, 但是他常常请假去旅行以及准备要付印的材料。他在讲课时, 除蒙古语以外, 还讨论通古斯语和突厥语跟蒙古语的比较形态学。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使他能够在“蒙古—突厥语言的动词词干构成法”(Zur Verbstammbildungslehre der mongolisch-türkischen Sprachen) (JSP-Ou XXVIII, 3, 1912)一文里, 提出在两个语族里都出现的十八个后缀。突厥语的材料引自拉德洛夫的词典, 他的“突厥语形态学描写的初步设想”(Einleitende Gedanken zur Darstellung der Morphologie der Türksprachen), 格伦贝什 (Gronbech) 的 “Fors-tudier til tyrkisk lydhistorie”, 汤姆森(Thomsen)的鄂尔浑碑文 (Inscriptions de l'Orkhon), 以及阿什玛林 (Ashmarin)、卡塔诺夫、包特林克、亚斯特里姆斯基 (Yastremskiy) 和梅里奥兰斯基 (Melioranskiy) 的著作。有时候他也从卡斯特连和扎哈罗夫的著作里引用满—通古斯语的例证。

兰司铁在“突厥—蒙古语语音规律”(Egyállítólagos török-mongol hangtörvénysz) (NK XLII, 1913, pp. 69—74)一文里批评了涅茨茨(Gy. Németh)的论文“突厥—蒙古语语音规律”(Egy török-mongol hangtörvénysz) (NK XLII, 1911—12, p. 401ff)。按照兰司铁的意见,涅茨茨的论点里只有一个是讲得通的,即,突厥语 *ti*~蒙古语 *či* 的对应。突厥语 *tag* ‘石头’=楚瓦什语 *tʰəʎi*=蒙古语 *čilaYun*< **čilaYun* 这个等式(涅茨茨 p. 404, 兰司铁 p. 70)当然意味着还有一项兰司铁在此处没有提到的象 **tʰal*’>*tas* 这样的附加假设。他也谈到由果姆伯兹(Gombocz)和涅茨茨提出的,未经周密检验的突厥语的 *l* 音化和 *r* 音化的解释: **s*>**z*>*l* 和 **z*>*r*。

兰司铁还提到涅茨茨的论文“突厥—蒙古语假说”(Die türkisch-mongolische Hypothese) (载 ZDMG 66, 1912, p. 551ff.)。涅茨茨在565页上把所有三个语族的若干单词,即,类似身体各部分的一般概念的名称等做了比较。虽然采用了烦琐的方法,但是,涅茨茨还是指出了,无论如何值得注意的,甚至在两个语族之间几乎都没有清晰的共同点。正如作者所强调的,一定限度的解释是根据“一些跟蒙古语有关的突厥语单词”作出的。已故的杰拉德·克劳森(Gerard Clauson)爵士利用语言年代学家提出的基本词汇完成了一次更严密的同类实验[“阿尔泰理论的词汇统计学的评价”(A Lexicostatistical Appraisal of the Altaic Theory) CAJ XIII, 1969, pp. 1—23]。但是,由于他只从可以得到的最古老的材料里选录材料,他的材料是零碎不全的,而且在许多方面很有限,因而不是典型的材料。他的方法以及他的成果必然地也易受批评。另一方面,克努特·伯格斯拉德(Knut Bergsland)和汉斯·沃格特(Hans Vogt)在他们的论文“论语言年代学的确实性”(On the Validity of Glottochronology) (Current Anthropology 1962)里证明了那种方法行不通。艾特科宁*(Itkonen)也说(p. 390)芬兰语和齐尔延语(Ziryen)的关系就如同芬兰语和拉普语。据我的意见,还是应当利用全部可以得到的词汇材料重作涅茨茨和克劳森的试验。涅茨茨在同一篇论文里(p. 569)说起同源假说“我们应当首先借助语音规律对各种情况进行深入的分析”。但是,他的甚至后继都可以“毫无限制”地借入的意见根据已知的语族判断缺乏证据。

兰司铁在“NK”同一卷(pp. 229—238)的另一篇论文“Az ŋ hang a mongolban és a törökben”里讨论了上面谈到的他给赛合泰的信里概述的各种演变。通古斯语的对应偶尔也被引用,比如象通古斯语 *gele* ‘受惊吓,’满语 *gel-e-*, 蒙古语 *geime-läc-* ‘河前’。论文的大部分是讨论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对应情况以及它们进一步的特殊演变,比如(p. 232)蒙古语 *moŋYul*: 察合台语 *moɣul*: 乌梁海语 *möl*, 或者(p. 234)突厥语 *köŋül* ‘心,胸’: 楚瓦什语 *kəmal* ‘心’: 萨盖语 *kə* ‘同前’: 蒙古语 *kəmlüdarǵe* ‘攀胸’; 蒙古语 *kümün* ‘人’: 卡尔梅克语、厄鲁特语 *kūmɿ*: 卡尔梅克语 *kün*: “秘史” *kuʼun*: 喀尔喀语 *xuŋ*。在讨论元音间的情况时(p. 233),通古斯语的形式也作了比较,例如,察合台语 *bajuz*~*mūguz* ‘角’, 吉尔吉斯语 *mūjaz*, 阿尔泰语 *mūs*, 雅库特语 *muos* ‘骨制品’: 卡尔梅克语 *mörsɿ*, 古蒙古语 *mögörs*: 通古斯语 *C mūgörsün*; 通古斯语 *C ti-gän*~*tygen* ‘胸’, 满语 *tuggen*: 蒙古语 *čigeli*, 喀尔喀语 *tʰədʒ*: ‘攀胸’; 通古斯语 *C siŋiksä*~*səŋuwa*: 蒙古语 *siŋaderi* ‘露水’, 通古斯语 *C simŋan*, 戈尔德语 *siŋmō* ‘影

* Erkki Itkonen, Kieli ja seu tutkimus, 赫尔辛基 1966。

* 某些阿尔泰语单词的匈牙利语译文看来不大可靠。

子’：蒙古语 *segader*，卡尔梅克语 *südr* ‘同前’。

兰司铁在“东方学杂志”(KSz) XV, 1911—1915, pp.134—150发表了论文“蒙古—突厥语音史”(Zur mongolisch-türkischen Lautgeschichte) (I和II)，研究两个语族里处于词的各种位置上的 *č* 和 *j* 的所有表现。除了有关蒙古语 *č* < *ti 以及发生了后一阶段的同化和异化的情况之外，看来在两个语族之间有明显的对应。兰司铁在一些例证里也能引用各种通古斯语类似的对应。至于兰司铁改写成 *š* 的蒙古语的 *j*，情况比较复杂，因为蒙古语 *di > *j*；而另一方面，在突厥语里 *j* ~ d ~ y ~ > y。但是他能够在大多数例证里搞清各种关系并同时矫正拉德洛夫和涅茨茨的某些解释。兰司铁自己的解释常常简略得使人难于理解其真意，例如(P, 140)，“蒙古语里的外来词有时以 *š* 代替 *č*，例如，喀尔喀语 *tš'awgonts'o* ‘尼姑’，书面语是 *šibaganča* < 粟特语；喀尔喀语 *tš'i'xor* ‘糖’，卡尔梅克语是 *sik!* ‘同前’ < *Siker* (< *p)。在通常情况下的确是 *č*，例如，*čagarig* ‘铁坏’”；在第一个例证里 *č* 当然是蒙古语的一个改造而不是准确的 *š*。按照蒙古语的对应来讨论突厥语 *y* 的复杂词源就变得比较简单。兰司铁在“东方学杂志” XVI, 1915—16, pp.66—84发表的论文的第三部分里按照上述方法进行了工作。但是对照满一通古斯语却有相当的出入。另一方面，蒙古语和突厥语的对应往往彼此接近得看来不可能确定它们是代表同源关系形式还是借词。参看例如，蒙古语 *yara* ‘伤’：突厥语 *yara*，蒙古语 *yala* ‘刑罚’：突厥语 *yaia*。但是正如上例，艾特科宁指出，遵守语音规律的占借词也能看作是这些形式，甚至是语言学同源的充分证据（例如，雅利安语 *sata* 的芬兰—乌尔语类似的 forms）。这类借词在兰司铁的著作里常常和“阿尔泰”起源的单词并用。

由于芬兰和匈牙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交战国，所以在匈牙利发表芬兰学者的论文的手续相当复杂，论文的发表是靠丹麦和瑞典的学者们善意的斡旋实现的。

顿奈尔^②指出，用来证明所谓“阿尔泰”语言同源的材料的相似事实上太明显了，而不相似的单词和形式之间的合乎规律的语音对应的规则性是原始发生学同源关系的一个极其有力的证据。兰司铁在更彻底地研究各满一通古斯语言时发现了不同语言的单词之间的一个明显的规律性对应。1900年，威廉·格鲁贝(Wilhelm Grube)在他的《那乃(戈尔德)语—德语词汇》(Goldisch-deutsches Wörterverzeichnis)里已经说到，一些通古斯语里的 *x* ~ *h* 或 0 (零)和另一些语言里的 *p* 对应。兰司铁在伊万诺夫斯基(A. O. Ivanovskiy)发表的达斡尔语实例里(Mandjurica I, 圣彼得堡, 1894)发现了有词首 *h* 的单词，这些词也出现在一些最古老的蒙古语文献里，例如，“秘史”[他利用的是波兹德涅夫(Pozdneev)发表的文本]，“伊本·穆哈纳书”(Ibn Muhanna)，“Kirakos”等，而古典文学蒙古语和别的活方言都完全失去了 *p* 及其各种反映形式。当时不了解在各种突厥语里的初始的 **p* 的遗迹。兰司铁在论文“蒙古—突厥语的词首清唇音”(Ein anlautender stimmloser Labial in der mongolisch-türkischen Ursprache) (JSFOu XXXII, 2, 1916—20)里提出四十三个词源(形式)，但是只有八个也扩展到各种突厥语里。

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在“亚洲学杂志”(JA) 1925, pp.193—259发表了论文“现已消失的，十三—十四世纪蒙古语的词首 *h* 音”(Les mots à h initiale, aujourd'hui amuie dans le mongol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他在论文里(p.194)说：“兰

② Öfersikt af den Finsk-Ugriska språkforskningen historia, Helsingfors, 1872, p. 108f.

司铁关于突厥—蒙古共同语有一个古的词首唇音的作品是对阿尔泰语言比较语言学的重要贡献。”除了兰司铁使用的材料外，伯希和还考虑了整部“秘史”，“华夷译语”，“伊本·穆哈纳书”，曼耐尔海姆（Mannerheim）和波塔宁（Potanin）的黄裕固语和锡林郭勒语材料，以及施密特（P. Schmidt）和史禄国（D. Shirokogoroff）的通古斯语词汇表。伯希和根据最古老的蒙古语材料提出九十六个保存了词首 $h < *p$ - 的例证。但是，并不是所有这些例证在满一通古斯语里都有清晰的对应，而且突厥语的对应比较罕见。当田清波（Antoine Mostaert）和斯麦特（A. de Smedt）在三十年代发表了他们关于甘肃的蒙古人说的蒙古语（土族语）的重要论文时，初始的 $*p$ 由 f - 代替就清楚了。兰司铁的学生雷赞恩证明了（UJb 19, 1939, p. 101ff 和 Materialien I p. 21 和 p. 167）甚至在突厥语里看来也发现了从 $*p$ - 到 ϕ 演变的 h - 阶段的各种反映形式。

兰司铁后来对朝鲜语的阿尔泰共同性的研究表明，朝鲜语里也保存过初始的 $*p$ -，例如朝鲜语 $pul-li$ -‘泡’；通古斯乌利奇语 $puri$ -‘跳水’，女真语 $furiši$ ‘西方’，蒙古语、“秘史”、“华夷译语” $hōrene \sim hōrōne$ ‘西方’，突厥语 $ördäk \sim hōrdäk$ ‘鸭子’，朝鲜语 $phul$ -‘草’；通古斯语 $huli$ ‘幼年’，蒙古语 $ōle$ ‘新鲜的’，突厥语 $öl$ ‘同前’， $blāq$ ‘牧场’，楚瓦什语 $valem$ ‘一抱干草’，朝鲜语 $phul$ -‘擦，磨’；满语 $furu$ -，蒙古语、“秘史” $hūrū$ -，蒙古语 $L \text{ } ürū$ -‘磨’，突厥语 $üz$ -‘中断和约’；朝鲜语 pil -‘请求’；满语 $firu$ -，通古斯语 $hiruge$ -‘同前’， $hiruri$ ‘道士’，蒙古语 $Q \text{ } hirū'e$ ，蒙古语 $L \text{ } iräge$ -‘请求’；等等。我们在卡拉伊的突厥方言里，特别是在昆都鲁德次方言（Kondurud）里，遇到一个 h -，它在许多例证里看来明显地出现在（根据其它阿尔泰语言的证据）有或有过 p - 的那些词里（见米诺尔斯基（V. Minorski），“卡拉伊的突厥方言”（The Turkish Dialect of the Khalaj, BSOAS X, 1940—42, p. 418ff.）。看来卡拉伊语能够在语音系统里保存 h -，大概是由于波斯语的影响，而且看来这个音后来甚至还传入有初始的词首元音的单词：法语的形容词 $haut$ 是这种普遍了解的现象的一个典型例证。

兰司铁对 $p > f > h > \phi$ 的语音演变的解释没有说服所有的学者。例如，克劳森承认所讨论的单词无疑属于同一类，但是否认它们有证明同源说的价值。按照他的意见，我们必须从零开始：“在某些情况下，一个词首元音变成吐气的，而且…吐气音在适当的时候变成 f ， f 又变成 p ”（JRAS 1956, p. 211 和 BSOAS 24, 1961, p. 304）。多尔费尔（Doerfer）看来提出一种类似的语音演变（JSFOu 65, 4 p. 6）“唇音前的 f ，如在 $fuguor$ ‘公牛’一词里，是由中期蒙古语唇音前的 h - 受同化变来的。”伯希和在他上述的论文（p. 251 fn. 1）里事实上反驳了这种议论：“在蒙古语和通古斯语的一致性上，对于同义词以及个别词来说，大多数现象要接受兰司铁的见解和我提及的语音变化的规律。”不过，多尔费尔后来在“阿尔泰学的两个重要问题”（Zwei Wichtige Probleme der Altaistik）（JSFOu 69, 4）一文里驳斥了克劳森的意见并且为兰司铁的法则辩护，但是他说：“突厥语里带 h - 的形式是在蒙古时代之后才有的，在某一个时期里，突厥语已经吸收了大量的带 h - 的波斯语、蒙古语借词，所以无论如何它在它的语音系统里已经有了 h -。”他在1968年对德国东方学家会议的一次讲演（发表于 ZDMG Suppl. I, Wiesbaden 1969, p. 721）里说， h - 是“原始突厥语的”并且在卡拉伊语里保存了。多尔费尔在 ZDMG 118, 1968, p. 105 关于卡拉伊语的论文里又一次断言“原始突厥语”曾有 $*p$ -， $*p$ - 后来通过 $*f$ - 和 h - 消失了，而其它语言里的所有形式都是从这种“原始突厥语”借入的：他的例证如，突厥语 $oyma$ ‘毡袜’ = 蒙古语 $hoyima$ - sun = 满语 $fomon$ ，所谓来自“原始突厥语” $*poyma$ 的借词常常能用别的材料加

以扩充,例如,这里用的是:萨莫耶德语 hema ‘长筒靴’,peiima (Adelung und Fischer in Mser, 见 Joki p. 134) ‘绑腿’;突厥鞑靼语等 arik, 突厥语、察哈台语、乌兹别克语 haral ‘犁’, 阿塞拜疆语 harava ‘货车’, 东突厥语 harao ‘雪橇’, 蒙古语 aral ‘车轱’, 满语 fara ‘同前, 雪橇’, 戈尔德语 para ‘雪橇’, 朝鲜语 palgo ‘同前’, 等。按照多尔费尔的说法, 蒙古语里比较古老的突厥借词显示保尔加尔语 (Bolgarian) 特有的方言特征 (IF 71, 1966, p. 115); 看来也是一个包括几个历史上和地理上的难题的假说。

按照多尔费尔的意见 (1. c. p. 112), 满一通古斯语里的蒙古借词代表一个十分古老的时期, 因为它们反映 “原始蒙古语” 的 p-: “所以满语的 fulgiyan ‘红’ (dschartschen fulagian; 在那乃语里以 p- 与 f- 相对应, 这是原始通古斯语的形式) = 蒙古语 hula’an (<*pulaian)。这个古老的语层可能源自十三世纪以前的某一时期。” 他的意思是不是说, 古通古斯语的 p 也是从蒙古语借来的, 这一点仍然不清楚; 而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在什么时候借入的。多尔费尔引用李盖提 (Ligeti) 的论文 “满语里的古代蒙古语成分” (Les anciens éléments mongols dans le mandchou) (AOH X, 1960, pp. 231—248)。李盖提在这里 (p. 237) 把满语原有的反映 f- 的词和借入的反映 f- 的词明确区分开来, 女真语单词已经反映 f- 了, 而金代 (Kin times) 的那些单词还有 p-。因此, 李盖提提出, “蒙古语” 借词正如 p- 一样, 显然是自契丹语借入女真语的, 不过后来在明朝时女真语和满语都产生了 f-。所以词首 p- 在蒙古语里出现的年代要比一般推定的年代迟得多。但是, 我不能理解, 李盖提的理论怎么会支持多尔费尔的有关的单词起源于突厥语的解释。

在讨论汉语借词 p’ao ‘砲, 步枪’ 时, 可能发现一个确定通古斯语的语音演变 p->f->h- 的年代的方法, p’ao 在通古斯语里是 ho-huo, 在蒙古语里是 bu。

我们在印欧语里见到一个十分相似的连续例证: 例如, 希腊语 πατηρ, 拉丁语 pater, 梵语 pitar-, 哥特语 fadar, 沃塞梯语 fod, 亚美尼亚语 hayr, 古爱尔兰语 athir ‘父亲’, 其它例证是 p->φ- 演变的各个时期自爱尔兰语借入的借词的解释, 大概难于使人赞同。

兰司铁在一篇发表于芬兰语评论 “Virittäjä” (21, 1917, pp. 37—39) 的论文 “Suomalais-ugrilaisen komparatiivin alkuperä” 里把芬兰—乌戈尔语 -m-pa-~-em-pa- 形式的比较级解释为一个 -em- 形式的动词的分词, 并把它和突厥语 -raq 形式的比较级相比, 突厥语的这个比较级是来自一个 -ra- 形式的由名词派生的动词的动名词, 而且, 它和蒙古语 -ray 形式的指小词形容词对应, 参看突厥语 kök ‘兰’ (kögär-), kökräk ‘深兰’; 蒙古语 köke ‘兰’, kokereg ‘浅兰’。涅茨茨在 ZDMG 66, 1912, p. 574 的论文里否认蒙古语里存在过后缀 -rag。但是兰司铁在 “动词词干的组成” (Verbstammbildungslehre) § 43 p. 35 (参看 “导论” II, p. 199) 一文里讨论过这个后缀。

1917年, 兰司铁被提名为赫尔辛基大学阿尔泰语言学特邀教授。但是, 他还没来得及利用自己财政上的可靠地位筹办所计划的刊物。就在1919年被任命为芬兰驻东京的代办。“戈申丛书” (Sammlung Götschen) 的德国出版者在此之前刚刚向兰司铁提出为这部丛书撰写阿尔泰语的比较语法。德国的通货膨胀和兰司铁的东京任职使这个计划未能实现。芬兰—乌戈尔语学会的档案里有一份兰司铁的手稿, 名为 “蒙古—突厥语言史稿论” (Grundriß der mongolisch-türkischen Sprachgeschichte), 大概就是前面提到的比较语法的草稿。

兰司铁在日本很快就对日语作到运用自如, 并且在居住在东京的一些朝鲜人的帮助下研究朝鲜语, 他在日本住到1930年。他一开始研究朝鲜语就注意到 aguri ‘嘴’ 这个词, 看来

正好和早几年他构拟的突厥语 *ayiz* ‘嘴’的假设的初始形式对应。这种发现促使他把朝鲜语和突厥语，蒙古语以及通古斯语作比较，而且立即发现了若干看来是朝鲜语和‘阿尔泰’语言共同的词。例如几个有词首 *p-* 的朝鲜语单词看来非常符合阿尔泰语 *p-* 的语音演变程式。

生活在伏尔加河畔的楚瓦什人的语言象切里米斯的邻人的语言一样，在语音演变方面很复杂。这个民族在人类学上和邻近的芬兰—乌戈尔人关系密切，而较早的一些学者甚至相信那种语言属于芬兰—乌戈尔语群。阿勒奎斯特在1856—59年的旅行里调查了楚瓦什语，并且断定该语言显然是一种突厥语。兰司铁在去东京任职前写的论文“论楚瓦什语的地位问题”（Zur Frage nach der Stellung des Tschuwassischen）里（JStOU XXXVIII, 1, 1922—23）力求阐明这种语言的语音史的某些问题。兰司铁成功地证明了语音规则的效力明显地暂时受了限制，作为这种情况的结果，在楚瓦什语单词里和各个时代从毗邻的突厥语言借入的单词里，原来相同的音位就按完全不同的方式演变了（p. 8等）。兰司铁的目的是为突厥语和蒙古语以及楚瓦什语语音史的某些问题找到比涅茨茨在“楚瓦什语里突厥—蒙古语音的演变”（A török-mongol a-féle hangok fejlődése a csuvasban）（NK XLII, 1913, pp. 75—85）一文里提出的解释更好一些的解释。按照涅茨茨的说法，必定有过两个 *a* 元音，他定为突厥—蒙古原始古语 *a₁ a₂*；*a₁*：突厥语 *a*，楚瓦什语 *i*，蒙古语 *a*；*a₂*：突厥语 *a*，楚瓦什语 *ü*；蒙古语 *i*，*ü*，*e*。在这里详细讨论涅茨茨和兰司铁的所有词源当然没有意义，我只提出兰司铁对涅茨茨想在里面发现 *a₂* 的例证的讨论：（涅茨茨 1, c. p. 83）突厥语 *ta* ‘石头’～楚瓦什语 *t'şu*～蒙古语 *cilayun* < **čjal* -；突厥语 *yaş* ‘泪’～楚瓦什语 *şul*～蒙古语 *nilbusun* ‘唾沫’ < **nial* -；突厥语 *saz* ‘苍白的’～楚瓦什语 *şur* ‘变白’～蒙古语 *sira* ‘黄色的’；突厥语 *san-* ‘想’～楚瓦什语 *şun-* ‘希望，祝愿’～蒙古语 *sana-* ‘想’；突厥语 *bir* ‘一’～楚瓦什语 *pür* ‘全部’～蒙古语 *büri* ‘全部’；突厥语 *yalın* ‘火焰’～楚瓦什语 *şulam*～蒙古语 *jali*；突厥语 *tal-* ‘尝’～楚瓦什语 *tuda*～蒙古语 *tači-ya* < **tati* -；突厥语 *saz* ‘沼地’～匈牙利语 *sár* ‘草原’～楚瓦什语 *şur* ‘沼地’～蒙古语 *şiruyai* ‘土地，灰尘’，兰司铁特别注意突厥语里表现为 *ş* 或 *z* 而楚瓦什语的对应词分别有 *l* 或 *r* 的单词。我们在其它阿尔泰语支（sub-group）的对应词里也发现 *l* 和 *r*。兰司铁提出，阿尔泰语里最早有过两个不同的音位集合（phonemic sets），当时它们或是一致或是向不同方向演变，即：

$$\begin{array}{ll} *l > l & *l > l \sim \text{突厥语 } \check{s} \\ *r > r & *r > r \sim \text{突厥语 } z \dots \end{array}$$

兰司铁的例证，如突厥语 *siş*，雅库特语 *iş* ‘山猫’；满语 *silun*，蒙古语 *silögösün* ‘同前’。突厥语 *buz* ‘冰’，楚瓦什语 *pär*，蒙古语 *bürüm* ‘糖’，是罕见的，而且不太好。他也说（p. 27）他将在另一篇论文里提出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但是这篇论文从未发表。

兰司铁在论文末尾清楚而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楚瓦什语在阿尔泰语里的地位的见解：“这是完全清楚的，楚瓦什语是突厥语言有规律的发展，而它却与蒙古语没有直接的关联。”因此，譬如说，阅读本青（Benzing）的“导论”（Einführung）（p. 128）就使人有点困惑，他说：“其它人（特别是兰司铁）都有这种论述：楚瓦什语是在阿尔泰语系的突厥语和蒙古语之间的一种独立的语言。”

马克沃特（J. Markwart）在 UJb 1929 p. 891，发表了在公元六世纪下半叶拜占廷材料上发现的若干突厥语单词，按照他的意见，这些词证明兰司铁的学说是正确的：Xepzip =

古突厥牌文 Qırqız; 'Orw = 古突厥语 (OTu) Oγuz; Oúvvoγούποι = 古突厥语 Onoyuz; Kouλουβρος = 古突厥语 qolayuz。按照我的意见,在撒马尔干(Samarkand)的突厥语名字 Sämizkänd = Μαράχανδα (<*Smarakanda) 里可以看到一个类似的语音演变 Strabo XI 11, 4, Arrian. anab. III 30, 6, IV 3, 6, 6, 3. 16, 2。楚瓦什语在借词里表现多种多样的语音演变,但是, r < z 楚瓦什语 erne ‘周’ < 波斯语 ādina 的某些例证,例如,在各种芬兰方言里没有相似词,那些方言里初始的 δ 可能由 d ~ r ~ l ~ t ~ j ~ φ 代表。各种语言 z 音化的例证已由例如叶斯帕森(Jespersen)提出了〔“语言”(Language), 伦敦, 1922, Ch XIII § 6〕。l > š 的演变看来寥寥无几; 标准的例证可能是拉丁语 planus > 西班牙语 llano ~ 葡萄牙语 chao。

兰司铁在朝鲜语里发现的证据进一步支持了他关于其它语言的 (*l' >) i 和 (*f >) 的起源 (originality) 以及突厥语 š 和 z 的第二特征 (secondary character) 的见解,例如,朝鲜语 aguri ‘嘴’; 土耳其语 ayız, 朝鲜语 kal- ‘挖’, 蒙古语 qarun- ‘同前’; 土耳其语 qaz- ‘同前’; 朝鲜语 iraq ‘沟脊’, ‘界线’, 楚瓦什语 jaran ‘界沟’, 满语、戈尔德语 irun ‘同前’; 土耳其语 izaq ‘同前’; 朝鲜语 pal ‘脚’, palmak ‘鞋’; 土耳其语 baš-maq ‘鞋’; 朝鲜语 kjeil ~ kjeul ‘冬天’, 楚瓦什语 xal ‘同前’; 突厥语 qis ‘同前’; 朝鲜语 til- ‘进’; 突厥语 taš- ‘同前’, 等。

阿尔泰语言的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它和乌拉尔以及达罗毗荼语系都有——是用动词表示否定。否定动词的词形变化不完全,但是,它们的动词特征还是非常明显的。兰司铁在一篇根据1919年向学会发表的一次讲演所写的论文“阿尔泰语言的否定”(Die Verneinung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 (MSFOu LII, 1924, pp. 196—215) 里论述了蒙古、突厥和通古斯语族的否定。他的主要论点是,否定动词本身看来最早有‘是’,‘仍是’等(肯定的)意义,这种意义后来在某些短语里变成了表示一个行为的对比。因此,通古斯语 a- ‘不…’ 本身和蒙古语 a- ‘是’ 相同,通古斯语 e-, Praes. esi- ‘不…’ 又和蒙古语 ese 相同。在突厥语里动词否定形式由后缀 -m-a 构成,兰司铁曾经试图在带 -m 的名词性形式的主要动词后边发现动词 a- 或 e- (§ 18 p. 210f)。雷赞恩又发现 (II p. 232) 突厥语的否定动词 e- 是芬兰—乌戈尔语的否定动词 e- 的对应词。否定结构在“导论”里没有单用一章加以论述。显然,兰司铁仍然认为上述论文的论述是充分的。兰司铁在“导论” II p. 87 提出了对 -maz < *m-āf ‘是’ 的解释 (在《否定》一文的 p. 212f. 顺便提到)。雷赞恩 (l. c.) 认为这种解释不大确切。

兰司铁在很多学术团体里谈到过缺少满—通古斯语的具体材料。他在东京时努力引起日本语言学家调查各种通古斯语和方言的兴趣。例如,他1922年向东京蒙古语学会发表的一篇讲演里,强调了把调查自各方面借入的借词包括在内,对于研究通古斯语,吉利亚克语 (Gilyak), 朝鲜语和虾夷语 (Ainu) 是多么重要。

兰司铁研究朝鲜语的第一个成果是1928年发表的论文“论朝鲜语”(Remarks on the Korean Language) (MSFOu LVIII pp. 441—453)。在这篇论文里,他在把词尾变化和派生成分跟阿尔泰语的这类成分作比较时,对这种语言作了简短的语音描述并且简单地讨论了形态学。也作出了一些和阿尔泰语单词的词源比较: 朝鲜语 mal ~ mār < *mor; 蒙古语 mori ‘马’; mul ~ mül < *mül ‘水’; 蒙古语 mören ‘河’; til ~ til ‘大草原’; 戈尔德语 dul 参看 SKE p. 266 修正的形式; tto ~ pto ‘又’; 通古斯语 hata, 索伦语 hata-ma ‘又’; keru ‘小船’ < *keray; 戈尔德语 gela ~ gella ‘大船’ (发表的其它论文里没有);

tol~tor ‘石头’：戈尔德语 *šollo~šolo*，原始突厥语 *t al > 突厥语 ta ~ 楚瓦什语 t šul (参看 SKE p. 272)；pul~pur ‘火’，pulkta ‘热烈的’，pulgin ‘红的’ (后来历次发表时这两个词是分开的)；蒙古语 *ulayan* < *pulayan，满语 *fulgiyan*；čelmegi ‘少年，孩子’ < čermegi；蒙古语 (“仍见于西北蒙古”) 突厥语 čermeg > 匈牙利语 *gyermek* ‘孩子’ (参看 SKE p. 28 čelmda)；erüsin-ne ‘老人’ < eru-：突厥语 örü ‘老的’ (?) 和 nai ‘男人，人’：戈尔德语 *nai~ne~ni* ‘男人，人’；方位格里的 al arü~are “在…下面”：突厥语 al- ‘在…下面’，ü~*uh (< *g~*üg) ‘在…上面’：通古斯语 ug ‘在…上面’ (参看 SKE p. 284f. 材料更广泛)。

看来兰司铁从未注意到，著名苏联学者波里瓦诺夫 (E. D. Polivanov) 在 1927 年发表了一篇论朝鲜语的阿尔泰同源关系的论文 (IAN, Ser. VI vol. XXI, 2, p. 1195ff.)。波里瓦诺夫的论点基本上和兰司铁相同。可是也有一些较小的差别，例如，波里瓦诺夫把突厥语 *küz* ‘秋天’，楚瓦什语 *kər* 跟朝鲜语 *kjeul* ‘冬天’作比较，兰司铁则把这个朝鲜语单词和突厥语 *qış*，楚瓦什语 *šəl* ‘冬天’联系起来，波里瓦诺夫又认为这两个词和朝鲜语 *kajl* ‘秋天’一致。至于朝鲜语 *köl* ‘谷地’，波里瓦诺夫看来只把它和满语 *golo* (写成 *xolo*) 连系起来，而没有提到蒙古语和古突厥语的对应词 (‘导论’ I p. 48)。在讨论阿尔泰语 r：朝鲜语 r/i 时，波里瓦诺夫也对照突厥语复数后缀 -lar~ler，雅库特语等 -tar~-dar，蒙古语 -nar 和朝鲜语 -tal~-dal (-tar~-dar)；作为朝鲜语复数后缀，兰司铁 [‘朝鲜语语法’] (KGr) § 80, SKE p. 266 只引用 -tjil~-dijl，北部朝鲜语 -ter~-tjir。波里瓦诺夫把朝鲜语形式 *niram* ‘名字’和蒙古语 *nere* 联系起来，兰司铁的材料里没有出现这个朝鲜语形式，而突厥语 *turna*；朝鲜语 *turun* ‘鸛’，这个例证看来也一样 (参看雷赞恩 TEW p. 501)。波里瓦诺夫进一步把朝鲜语 *mil* ‘小麦’和满语 *mere*，粟‘做比较，兰司铁则引用满语 *bele* ‘粟’。

兰司铁在“米科拉纪念文集 (Festschrift J. J. Mikkola) (AASF:B XXVII, 1932, pp. 239—251) 里发表了论文“阿尔泰语言的腭化” (Die Palatalisation in den altaischen Sprachen)。这篇论文主要以通古斯语和朝鲜语材料为依据，它的目的是要证明在阿尔泰语言的历史语音演变里，“腭化”即在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之间或在元音和辅音之间出现一个 i，引起了特殊的语音演变。我们看到，在通古斯语和布里亚特语里腭化和非腭化的形式并存。一个元音后面的 -i 甚至可以影响前面的辅音，参看朝鲜语 *nai* ‘气味’：戈尔德 (那乃) 语 *ñä-* ‘腐烂’；在 -i 前面的复辅音受 -i 的影响腭化了：1. rg>fg>ig>f~š；通古斯语 C urgä ‘困难的’，戈尔德语 *xuđgo~xuigö*，涅基达尔语 *uigögdı* ‘重的’，奥罗奇语 *ugösi*，满语 *ušen*，乌利奇语 *xuš~si*；2. rk>fk>ix>č~c；通古斯语 C urkä ‘门’，涅基达尔语 *urkō~uikō*，戈尔德语 *ut’ku*，奥罗奇语 *uk’*；乌利奇语 *uč’*，满语 *učē*；3. lg>łš；戈尔德语 *χolgokta~olgokta* ‘杂草’，满语 *ulxu* ‘同前’；乌利奇语 *χolokta*，参看蒙古语 *qulusun*，朝鲜语 *köl*；4. lk>łč；戈尔德语 *silku-* ‘洗’，通古斯语 *selku-*，奥罗奇语 *siki-*；乌利奇语 *silčū-*，满语 *silgije-*，朝鲜语 *siri-šē-* (SKE p. 230 šjeriše)。可以设想这类语音演变适合于蒙古语 *qalbaya* ‘匙’，满语 *yalfiyan* ‘平，平而’；突厥语 *qasıq* ‘匙’。在原始突厥语里 l, f 和 i 强烈腭化，它们最终分别成为后来的 j, z 和 y。蒙古语的一个特点是 *ti>či, *di>ši, si>ši 的语音演变，在满语 ti>či, di>ši 里类似的演变发生得晚。

兰司铁三十年代在大学授课期间曾根据一篇铅印的报告作了几次关于阿尔泰语言 (包括